

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

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

第三集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

第三集

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

1993年5月

K207
120
3

粤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：谭天河

封面设计：黄丽雅

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（三）

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编

※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中山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

厂址：广州市中山三路

787×1092毫米32开11.625印张229,000字

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000册

ISBN 7-218-01371-6/Ⅰ·308

定价：7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本厂联系调换。

132007

前 言

《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》系列文集，作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(古籍研究所)的学术窗口，始编于1988年。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处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，得以交付出版。1990年10月，出版了第一集，收入论文16篇，共约20万字。1992年12月，出版了第二集，收入论文16篇，共约23万字。现将所内人员所撰论文13篇，译文1篇，附书评1篇，共约23万字，汇编为第三集，交付出版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我所地处广东，隶属面向华侨招生的高校暨南大学，再加上师承的关系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，现在，据此分设了三个研究室：岭南学术文化研究室，宋史研究室，港澳台文化研究室。今后，将主要集中于这三个领域的历史文化研究与典籍整理。此外，各位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专长，仍然继续自己选定的课题研究。从本集所收的论文中，也可以看出上述特点。岭南学术文化与港澳台文化的研究，目前刚刚起步，成果尚嫌不足，是今后加强的重点与努力的方向。希望在第四集中，能够更多地刊出这两方面的成果。

张其凡

1993年元月于广州暨南园

目 录

前言	张其凡(1)
略述《孙子》的战略观、将才论和治军思想	袁钟仁(1)
刘汉政权与楚国文化——兼论辞赋源流	毛庆耆(18)
汉代辞赋理论	毛庆耆(35)
唐宋时期城市饮食业述论	林立平(74)
唐宋之际城市木土工匠的劳动与生活	林立平(104)
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记述君臣事迹试探	李 坤(114)
宋初政治与宗教	
..... (日本)竺沙雅章撰 淮 沛译	(125)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点校本 (7—12册)校读志疑	张其凡(153)
《山堂考索》中保留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佚文	汤开建 陈文源(186)

132004

李昉英《文溪诗》考释	杨芷华(243)
李昉英后人初探	杨芷华(284)
陈维崧年谱(上)	陆勇强(310)
《海国图志》外国地名中的“倒”	陈 华(333)
略述方志小说中的人文意蕴	辛 谷(339)
书评转载：张其凡著《赵普评传》	(香港)何冠环(354)
附录：本书1——2集目录	(363)

略述《孙子》的战略观、将才论 和治军思想

袁钟仁

我国春秋时代名将孙武所著《孙子》（又名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武兵法》），是世界最早的军事学杰作。它和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（K.V.Clausewitz 1780—1831）的《战争论》，在国际上均享有很高的声誉。然而《孙子》成书年代比《战争论》大约早两千年，其中某些观点比《战争论》还要全面。《战争论》从1831年出版后便毁誉不一，鲁登道夫（E.Ludendorff 1865—1937）在其1935年出版的名著《全民族战争论》中，认为克氏理论已经过时，而《孙子》则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。无论是法国拿破仑、德国威廉二世、英国蒙哥马利、美国施瓦茨科普夫以及苏联、日本等国军事家，都对《孙子》颇为推崇。因此它的一系列观点，现已成为西方制订军事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。

《孙子》内容十分丰富，它既是军事学著作，也是哲学著作。它不仅用于指挥作战，也可用于企业管理、市场竞争、体育比赛和外交谈判。日本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运用《孙子》使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，以后他编写了30多本运用兵法从事经营的著作。《孙子》的理论如此普遍受到重视，

这是因为它研究了敌我、主客、众寡、强弱、攻守、进退、奇正、虚实、动静、勇怯、治乱、胜败等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关系,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,具有朴素、原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。其战略观所提出的谋略思想,现在成为各种行业在竞争中取胜的指南;其将才论对于选贤任能的标准,至今可作简拔人才的参考;其治军思想富有法治精神,法治是任何社会走上正轨的基础。

《孙子》的战略观

历来被誉为“武经”、“百代谈兵之祖”的《孙子》,并不鼓吹、提倡战争。它最重要的观点表现在《孙子·谋攻篇》:“百战百胜,非善之善者也;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”。1992年4月在我国山东临沂举行的第三届《孙子兵法》国际学术研讨会认为:“这一战略观将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战略观,从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发挥作用。”在这之前,日本学者和美国战略家就已认为这个观点触及了核战争的实质,具有现代意义。道理很简单,不用流血牺牲就使敌人失败,显然是善战的最高标准,战略的最佳选择,也是获取全胜的根本之道。

人们通常提及克劳塞维茨《战争论》中的名言:“战争不是独立的行为,而是政治的继续,政略的工具。”因为用政治手段可以解决的矛盾,就不必诉诸战争行动。而《孙子·

《谋攻篇》谈得更为透彻：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；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”这是说，领导战争最好的策略，应是在总的计谋上战胜敌人，其次在外交上战胜敌人，再次才是战胜敌人的军队，占敌人的城寨、土地。在战争中，败者固然十分悲惨，而胜者也得付出重大代价，甚至得不偿失。何况败者的复仇活动，更是难以预测。所以《孙子·谋攻篇》又说：“夫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……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战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；毁人之国，而非久也。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。”大凡作战的法则，使敌人举国完整地屈服乃是上策，出兵攻破敌国就差些；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乃是上策，击破敌人一个军就差些；使敌人全旅完整地降服乃是上策，击破敌人一个旅就差些；使敌人全连完整地降服乃是上策，击破敌人一个连就差些；使敌人全班完整地降服乃是上策，击破敌人一个班就差些。所以善于领导战争的人，屈服敌人的军队而不用战斗，夺取敌人的城寨而不用攻打，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用耽延时日。一定要用完善的计谋争胜于天下，所以不用劳顿军队就可以取得胜利，这就是运用计谋进攻敌人的法则。历史上有许多事例：周襄王二十五年（公元前 627 年），秦军以孟明视为主将，突袭郑国，途经滑国（在今河南偃师市），被郑国商人弦高发觉，弦高立即派人向国内告急，同时冒充郑穆公使者慰劳秦军，孟明视认为郑国已有准备，只好退兵，归途顺道灭掉滑国。可是滑国与晋国同姓，彼此关系密切，晋襄公认为秦

军灭掉滑国是对自己的侮辱，便联合姜戎在崤（在今河南陕县）设伏截击秦军，秦军全部被歼，主将被俘，这就是我国春秋时代著名的秦晋崤之战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弦高懂得运用政治手段，所以不费一兵一矢，便迫使秦军自动撤退，保存了郑国，这就是《孙子》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最好解释。而孟明视则不懂外交关系，结果丧师辱国。又如：梁武帝于天监四年（公元505年）冬派遣其弟临川王萧宏统军北伐，前锋被北魏平南将军陈伯之击败。这时萧宏要记室（相当于现在的秘书）丘迟以私人名义去信陈伯之劝降，陈伯之立即率领部属8千人归顺，一封书信就使敌人全军不战而降，体现了《孙子》“全军为上”的战略思想。而这封《丘迟与陈伯之书》，也成了我国千古传诵的名作。

《孙子》绝非反对战争，而是提出要慎重对待战争。《孙子·计篇》开宗明义提出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由于孙武生当春秋时代末期，在春秋时代将近3百年间，楚国消灭了50多个国家，齐国消灭了30多个国家，晋国消灭了20多个国家，秦国消灭了10多个国家，还有一批小国为其他国家所消灭。他深知一个国家不注重军事，就会有被消灭的危险。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在战争中取胜，《孙子·计篇》认为：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；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？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”在这里，“得算多”与“得算少”是指对于战争胜利所具备的条件。究竟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《孙子·计篇》提出要从5个方面进行考察：“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

民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。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道”是指政治，也就是要政治开明，使人民和政府齐心协力，可以同生死共患难而不怕牺牲，“天”是指天时，也就是阴晴、寒暑等气候季节情况。“地”是指地利，也就是远途、近处、险要、平坦、广阔、狭窄、死域、生地等地形条件。“将”是指将领，也就是将领的才智、威信、仁爱、英勇、严肃等品德才能。“法”是指法制，也就是军队的组织编制、通讯联络、内务规定、运输给养、军费装备等军队建设和后方勤务。根据上述情况进行判断，就可以预知谁胜谁负，任何一场战争的结局都无法超出这些规定。声威显赫的法国拿破仑一世不考虑上述因素，在1812年纠合了各国军队42万人去攻打俄国，以后再增派15万人，他充满轻敌思想，以为这场战争就可以使俄国屈服，没想到那些被他强迫征集的士兵无心作战，而且在盛夏远征，途中已出现给养困难，马匹大量死亡，军队纪律败坏，沿途与人民为敌，到达莫斯科时碰上严寒提前到来。善于预料敌情的拿破仑一世，这时完全出乎意外，他原先认为攻下莫斯科，俄国就会投降，但他接连发出3次求和信件都没有回音。在缺乏粮食和御寒设备的情况下，加上巴黎发生短暂政变和作为法国后方的西班牙遭到英军进攻，他只好退兵。撤退时，由于寒冷、饥饿、疲

劳、疾病、敌人不断的追击（尤其是在渡口），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惨遭覆灭，拿破仑一世也终于成了阶下囚，他给法国带来严重的灾难。

《孙子》坚决反对轻率进行作战。《孙子·谋攻篇》强调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只有深刻、全面了解敌我双方情况，才能在战争中扬长补短，趋吉防凶，察利知害，进退自如。对此，《孙子·计篇》提出：“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扰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”因为用兵打仗是奇诡行为，所以，能够作战却显示不能作战，要出动时却显示不出动，要向近处却显示要向远处，要向远处却显示要向近处。施用小利引诱敌人，制造混乱攻取敌人，敌人坚实要防备它，敌人强大要避开它，敌人愤怒要屈挠它，卑辞示弱使敌人骄傲，敌人安逸要使它疲劳，敌人团结要进行离间。进攻敌人没有防备之处，行动在敌人意料之外。此乃取胜的秘诀，不能事先作出硬性的规定。这样做的作用，就是要制造假象，使敌人产生错觉，难以了解我方真实情况，无法拟订正确的作战方针，并在敌人内部制造混乱，破坏敌人的一切部署，从而取得胜利。1991年2月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70万人，与伊拉克部队62万人作战，采用上述战略，地面战斗只用4天就大获全胜，难怪美国要其军官人手一本《孙子兵法》。

为什么“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”？因为世上一切事物都

在不断变化，军事也是如此。《孙子·虚实篇》解释说：“夫兵形象水。水之形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。”如何“因敌变化”？《孙子·军事篇》提出一整套主张：“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是故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此治气者也。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哗，此治心者也。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无邀正正之旗，勿击堂堂之阵，此治变者也。故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佯北勿从，锐卒勿攻，饵兵勿食，归师勿遏，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迫，此用兵之法也。”这是说，对于敌人的军队，可以打击它的士气；对于敌人的将军，可以扰乱他的决心。早晨朝气蓬勃，当午逐渐懈惰，傍晚多现疲乏。人们的精神态早晚不同，军队的士气也有类似情况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避开敌人的锐气，等待敌人松懈才进攻，这是对军队士气的掌握。用自己的严整来等待敌人的混乱，用自己的冷静来等敌人的错觉，这是对将军心理的掌握。用自己部队的接近战场来等待敌人的远道疲劳，用自己部队的饱食来等待敌人的饥饿，这是对军队战斗力的掌握。不去袭击配备周全的队伍，不去攻打实力雄厚的阵地，这是战略战术机动的掌握。至于用兵的法则，敌军占领山地不要轻率去仰攻，敌军背靠高地不要正面去强攻，敌军假装退却不要跟踪去追击，敌军精锐主力不要去进攻，敌军用钓饵引诱不要去吞吃。敌军退走不要去拦阻，包围敌人必须网开一面，否则敌军无路可走就会顽强抵抗，让它逃走而乘机截击更为有利。敌军陷入绝境不

宜过分进迫，以防它作殊死决斗，让它投降、撤退比继续作战较为上策。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，刘备攻占汉中，击杀曹操大将夏侯渊等人，曹操亲率大军前来，刘备守险拒战，指出：“曹公虽来，无能为也”。日子一久，曹军不少人逃亡，只好班师，于是刘备乘机扩大战果。因此，《孙子·作战篇》提出：“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”又说：“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”众所周知，长期作战不仅造成人员大量伤亡，经济严重困难，还会出现意料不到问题，以致产生事与愿违的结局。

《孙子》的战略观，我们根据中外古今的战史，可以充分验证其正确性。

《孙子》的将才观

要在战胜中取得胜利，必须有卓越的将领训练士兵、指挥作战。如果由碌碌无能的庸才、阿谀奉承的奴才、甚至是愚昧糊涂的蠢才来统率大军，对敌斗争，定然损兵折将，祸国殃民。世上本来就有超群绝俗的英才，但往往得不到长期重用，或因真知灼见而为上级排斥，或因建树不凡而为同僚嫉恨，甚至因功高震主而为昏君所害，终于报国受阻，令人不胜浩叹！“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”这是关系任何事业成败与否的首要问题。鉴于用人唯亲、妒才忌贤所造成的灾难，所以《孙子》选拔将才的观点，很值得深入探讨。

《孙子》很重视将领的作用。《孙子·作战篇》说：“故知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”《孙子·谋

攻篇》又说：“夫将者，国之辅也。辅周则国强，辅隙则国弱。”战国时期，赵国任用廉颇为将，屡胜强敌，改用赵括为将，就一败涂地。在周赧王五十五年（公元前260年）的“长平（今山西高平）之战”中，赵括改变廉颇的做法，盲目进攻，结果被秦将白起包围，赵括战死，全军40多万人被坑杀，从此国力严重削弱，便是一例。对此，《孙子》认为将领应该具有良好的素质，做到德才兼备。

在品德方面：将领应以整体为重，不计较个人利害，要有高尚的风格。《孙子·地形篇》说：“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无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惟民是保，而利于主，国之宝也。”从战争规律来看，一定会取胜，国君下令不打，可以坚持去打；从战争规律来看，不会取胜，国君下令要打，可以不打。所以进不求名誉，退不避刑罚，只想到保护人民，有利于国主，这种将领是国家的珍宝。周赧王五十八年（公元前257年），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（在今河北省），赵国向魏国求救，魏安厘王畏惧秦军强大，虽然派晋鄙统率10万大军前往救援，却采取观望态度。魏信陵君不顾个人安危，夺取晋鄙兵权，进攻秦军，这时楚国春申君也率兵救赵，秦军大败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邯郸之战。10年后，秦军攻魏，信陵君率领5国军队击退秦军，使秦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东出函谷关。信陵君保障了好些国家的安全，从而立下了大功。

将领要有完善的性格、良好的修养。《孙子·九变篇》认为：“故将有五危：必死，可杀也；必生，可虏也；忿速，可侮也；廉洁，可辱也；爱民，可烦也。凡此五者，将之过

也。”这是说将领有5种危机：定要拼死的敌方将领，显属有勇无谋，可设计杀害之；定要逃生的敌方将领，必然临阵畏缩，可急击俘虏之；暴躁易怒的敌方将领，往往受不起刺激，可欺凌欺侮之；清廉自爱的敌方将领，过分看重名誉，可污蔑羞辱之；爱护百姓的敌方将领，唯恐杀伤人民，不能舍短从长，可频繁骚扰之。上述5点是将领性格上的缺陷。因此，将领必须加强锻炼，不使自己的缺点、弱点被敌方利用，以免在战斗中失败。

将领要有稳健的作风。《孙子·九地篇》说：“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。”将领行事，要沉静以深思，严正而整治。那种声粗气浮，夸诞伪妄，轻佻僥薄，草率鲁莽之徒，必定败事无疑。东汉末年有一批力敌万人的勇将，如张飞、吕布、张郃、夏侯渊等辈，他们在战斗中所向披靡，只因虑事不周，终遭殒灭。他们本人被杀事小，有的误了全军、全国就事大了。

将领要有高度的责任感。《孙子·火攻篇》提出：“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怒可以复喜，愠可以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。”在战争中，没有利益不行动，没有所获不用兵，没有危迫不作战。国君不能因愤怒而出师，将领不可因怨恨而交锋。有利的才行动，不利的就停止。愤怒可以恢复到喜悦，怨恨可以恢复到愉快，灭亡的国家不可能再存在，死去的人民不可能再活着。所以贤明的君主要慎重作战，优秀的将领要警惕作战，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存

军队的要道。唐朝名将郭子仪在其6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，参与指挥历次重大战役，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达20多年。尤其在唐代宗永泰元年（公元765年）的“灵台（在今甘肃省）之战”中，他年近七旬，领兵万人，坚守泾阳（在今陕西省），捍卫京都长安，被吐蕃、回纥联军10万多人重重包围。他镇定自若，单骑前往回纥营中，说服回纥首领共击吐蕃，吐蕃惨败。这一来，不仅唐军免遭围歼，保存实力，长安也转危为安。郭子仪由高度责任感所产生的大无畏精神，令后人十分钦敬。

在才能方面：将领要有广博的知识，全面的本领，方可担当重任。《孙子·九地篇》认为：“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豫交；不知山林、险阻、沮泽之形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四五者，一不知，非霸王之兵也。夫霸王之兵，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敌，则其交不得合。是故，不争天下之交，不养天下之权，信己之私，威加于敌，故其城可拔，其国可蹶。施无法之赏，悬无政之令。犯三军之众，若使一人。犯之以事，勿告以言；犯之以利，勿告以害。投之亡地而后存，陷之死地而后生。夫众陷于害，然后能为胜败。”如果将领不了解外国政治动向，就不能预定外交方针；不了解山岭森林、险要阻塞、水网湖沼地形，就不能行军；不使用向导，就不能得到地利。这几样，有一样不了解，就不是霸王的军队。凡是霸王的军队，进攻大国，能使大国的军队来不及集中；威胁敌人，能使敌人的外交不能成功。因此，不争着和任何一国结交，不培植任何一国权势，伸展自己的意图，威胁加于敌人，所以敌城可以攻取，敌国可